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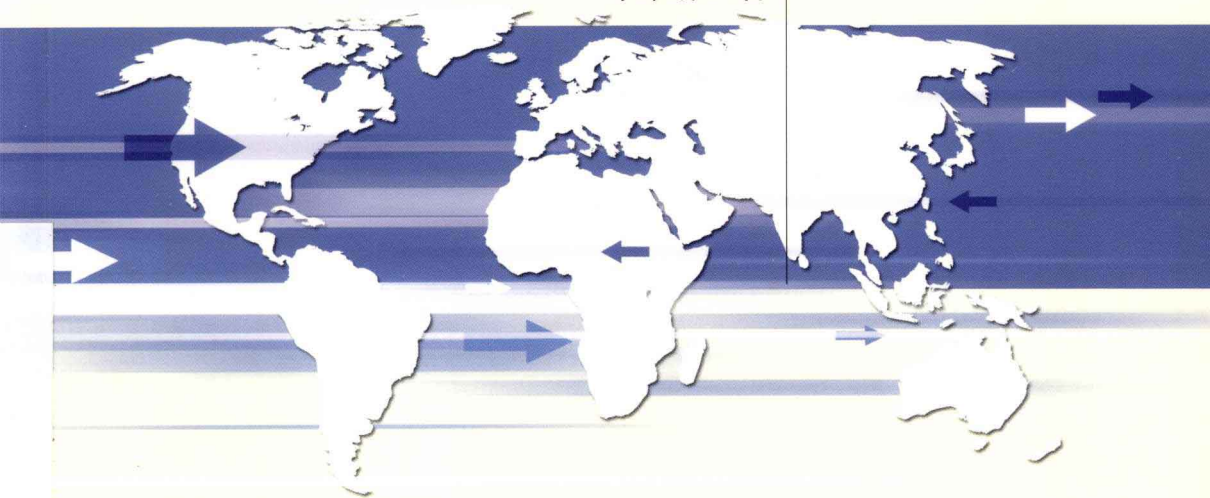
 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日本和朝鲜 封建政权改革比较

(1850~1860年代)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forms of Feudal Regime
in Japan and Korea during 1850s-1860s*

李永春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D731.39

11

 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013026384

日本和朝鲜 封建政权改革比较 (1850~1860年代)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forms of Feudal Regime
in Japan and Korea during 1850s-1860s*

李永春 / 著



北航

C16353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和朝鲜封建政权改革比较: 1850 ~ 1860 年代/李永春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
(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4072 - 9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封建制度 - 政治体制改革 -
对比研究 - 日本、朝鲜 - 1850 ~ 1860 IV. ① D731. 39
② D731.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0080 号

· 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

日本和朝鲜封建政权改革比较 (1850 ~ 1860 年代)

著 者 / 李永春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王玉敏 张文静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伟涛

项目统筹 / 王玉敏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字 数 / 339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072 - 9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朝两国统治者均面临“内忧外患”一时俱来的统治危机。在国内，两国封建制度急剧走向衰落，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当权者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欧美列强为在东北亚武力组建世界市场的最后环节，发起多次冲击，处于劣势的日朝两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三大矛盾交织在一起，内外冲突日益尖锐化，日朝封建政权滑向总崩溃的边缘，被迫做出反应，不约而同地展开一系列改革，即日本开港后幕府接连进行的安政、文久、庆应三次改革，以及朝鲜大院君政权推行长达10年的内政改革，以救亡图存。

在国际学术界，对日本开港后三次改革和大院君改革，已有程度不等的研究。但是，将上述改革作为19世纪50~60年代东北亚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历史现象，来加以分析和比较的学术研究，则几乎是空白。本书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将上述改革联系起来加以把握，力图更加客观、深入地探讨两国改革全过程，总结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

本书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绪论着重探讨日朝两国改革研究的学术研究踪迹，检点传统的观点，提出本书总体上的考察视角，即将两国改革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加以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在某个国家与国际关系体系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其历史进程，不能脱离国际背景论说某国的近代史。因为在欧美殖民主义势力的猛烈冲击下，各国的孤立状态已被打破，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世界已经连成一片。本部分力求更加客观、准确地为开港后幕府改革和



大院君改革进行历史定位，对两国近代化开端问题作出新的探索。

第一章着重对日朝两国改革的国际背景及其应对进行分析和比较。任何改革的到来都不是偶然的，往往与当时国际局势所造成的“外压”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两国改革最直接的国际背景，即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列强对东北亚的殖民征服，中国首当其冲，接连爆发的两次鸦片战争对日朝两国产生强烈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约、开港、丧失国家主权的严酷现实，对日朝两国统治者造成程度不等的心理压力和危机意识。但两国由于国情与政情的不同，因而在同样的国际背景下，应对方式却不尽相同。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本章对其成因进行了对比和分析。

第二章着重进行有关两国改革主导势力及其施政方针的探讨。一般来说，古今中外的改革，总要有当时的精英人士带头发动，并且形成的集团势力开风气之先，针对时弊，提出施政方针，以弃旧图新，摆脱困境。本章主要从日朝两国当时的国情和存在的国内矛盾入手，通过探讨改革主导力量的构成与演进，并就其提出的改革目标、改革步骤、实现改革目的所需途径等方面的构思，及其施政方针的异同，进行比较和分析。

第三章着重围绕日朝两国改革的主要措施进行评述，并加以比较。推行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制定具体改革举措和具体实施改革措施的过程。改革举措与能否实现改革目标直接相关，也直接影响改革的效果。这样，本章就与第二章、第四章之间形成内在的逻辑关系。在探讨了改革势力集团的施政方针之后，本章主要论述日朝两国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才等方面所采取的主要举措，也探讨了幕府开港后三次改革间的关联与互动，并对两国加强中央权力、克服财政危机、起用人才、强化国防等方面的主要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为两国改革结局的不同预作铺垫。

第四章着重比较改革结局的异同，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改革的结局如何，是研究改革课题的重要问题。与朝鲜大院君改革在权力斗争中戛然而止、人去政息不同，开港后日本的三次改革不仅前后相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且为明治维新的到来未雨绸缪。本章在论述两国改革结局差异的同时，从体制、官僚构成、外压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日朝两国改革结局不同的主要原因。

第五章作为本书的结论，笔者认为：由于战略位置、国情状况、执政者心态和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不同，日本幕府在开港后进行的三次改革和朝鲜的大院君改革，虽然在近代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均为两国近代化进程

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日本幕府在改革过程中崩溃，为明治维新的展开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大院君的下野并未触及封建政权的根基，势道政治继续存在，遏制了朝鲜自主展开近代化的可能性。对上述改革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明近代日朝两国何以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形成两种不同近代化类型等问题。

本书以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结合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工作的实践，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概括起来看，本书的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选题方面的创新

造成近代中日韩三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始终是学术界研究关注的对象，因为总结这个历史现象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日朝两国封建末期统治者进行的改革具有某些近代化因素。这一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引不起注意或被否认；对日朝两国改革进行比较分析，也是国际学术界尚未开展的研究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具有创新意义。笔者没有简单地陷入那种“成功者必然都是优点，失败者必然都是缺点”的僵化的思维窠臼，而是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中观察西力东渐之下日朝两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过程，并且将安政、文久、庆应改革与大院君改革加以对照比较，探讨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朝两国先后出现的封建政权改革高潮的兴起与展开，通过比较分析两国改革的异同，力图更加客观、准确地为大院君改革和开港后幕府改革进行历史定位，探讨日朝两国最终“同途殊归”的原因，并从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2. 史料方面的创新

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对开港后幕府改革和大院君改革的研究，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德川幕府或朝鲜政府主持编纂的官方文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笔者利用到日本和韩国考察、学习的机会，收集到反映主导改革的老中阿部正弘、政事总裁松平庆永、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以及为改革出谋划策的横井小楠、小栗忠顺等的思想和言论的资料，以及时任法国驻日公使罗修等参与改革过程的外国人的回忆录等幕末改革的有关资料，以及与大院君同一时代的人撰写的资料，如记录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状况的《龙湖闲录》《云下见闻录》，以及率领朝鲜军队击退法国侵略者的梁宪洙所写的反映丙寅洋扰时期情形的《丙寅日记》等第一手新资料，以求多层次、多角度对幕末改革和大院君改革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



3. 对日本开港后幕府三次改革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

综观学术界有关开港后幕府改革的研究，其尚处于起步阶段。日本的《国史大辞典》《日本史广辞典》等辞典中均收有关于安政、文久和庆应改革的词条，可见这三次改革已经成为固定的专有事件。从研究成果的题目来看，题目多样而分散，尚未出现对开港后幕府改革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成果。笔者将以往分别进行研究的安政、文久、庆应三次幕府改革，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作为日本近代化启动时期的探索性过程，分析三次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三次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分析和研究，努力反映开港后幕府改革的全貌。对于国内的日本近代史研究来说，本书对此课题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详尽的尝试。

由于本书是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比较研究，加之因相关史料缺乏和笔者对此课题的研究尚属初探，因此本书中存在不足之处亦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而分析日朝两国社会结构对改革的影响、两国民众对政府改革的反应及其社会效用等问题，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两国改革的国际背景：不断增强的“外压”	020
第一节 鸦片战争：邻国遭受“外压”的冲击	020
第二节 日本感受来自美国的“外压”	031
第三节 “洋扰”冲击朝鲜	042
第四节 “外压”及其对改革作用的异同比较	053
本章小结	073
第二章 改革主导势力及其施政方针比较	075
第一节 日本开港后三次改革主导势力、施政方针及其特点	075
第二节 朝鲜大院君改革及其施政方针	113
第三节 改革施政方针的异同比较	135
本章小结	148
第三章 改革主要措施及其比较	151
第一节 幕府在开港后三次改革的主要措施	151



第二节 大院君改革的主要措施·····	180
第三节 改革主要举措的异同比较·····	203
本章小结·····	215
 第四章 改革结局的异同及其原因分析·····	218
第一节 日本开港后三次改革的结局·····	218
第二节 朝鲜大院君改革的结局·····	232
第三节 两国改革结局的差异及其影响·····	242
第四节 两国改革结局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	256
本章小结·····	272
 第五章 两国改革历史定位的再评价·····	274
 参考文献·····	286
 后 记·····	301

一 研究意义

自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前期，工业革命的浪潮从英国扩展到西欧大陆和北美，东西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随着蒸汽轮船、机车铁路等新型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远洋和荒漠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阻碍。东北亚国家失去了昔日天然屏障的保护，成为欧美列强武力组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新目标。在社会发展阶段、综合国力、军事手段、文化渗透能力等方面均明显落后于欧美的东北亚国家处于劣势地位，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和转变的机遇。中国首当其冲，接连遭受两次鸦片战争的磨难。日本、朝鲜继而受到冲击，被迫作出反应。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指挥的舰队闯进浦贺港，以武力迫使幕府接受了美国总统要求开港的国书。1854年3月，日美订立《日美和亲条约》，日本被迫打开了国门；1858年日本与欧美列强订立“安政五国条约”，也被迫加入世界市场体系。1866年和1871年，法国、美国舰队对朝鲜发起军事征服，虽然未达到缔约开港的目的，但朝鲜被迫纳入世界市场也只是时间问题，同样暗藏着严重的民族危机。马克思一语道破了这种历史现象的经济动因：“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48页。



当时东北亚国家均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封建制度急剧走向衰落，国内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封建王朝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迫使日朝两国的封建政权不约而同地展开一系列改革，以救亡图存。此即日本在开港后连续进行的安政、文久、庆应改革和朝鲜的大院君改革。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却在日朝之间拉开差距，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原因何在？值得研究。为何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朝两国先后出现改革运动？这些改革主导者的思想和改革措施有何异同？如何评价两国改革的历史地位？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拟探讨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对于上述改革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总体评价偏低。国内外学者的评论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传统的观点就改革而论改革，未将其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笔者认为，应当在某个国家与国际关系体系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其历史进程，不能脱离国际背景论说某国的近代史。因为在欧美殖民主义势力的猛烈冲击下，各国的孤立状态已被打破，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世界已经连成一片。在这种新形势下，外因往往成为社会转变的决定性条件。因此，19世纪50～60年代日朝两国先后出现改革高潮与外压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两国的历史融入世界近代史之中。本书将开港后幕府改革与大院君改革放在欧美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东北亚诸国的历史条件下，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中观察西力东渐之下日朝两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有助于对其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价。

其次，传统的研究未将日本开港后三次改革与大院君改革对照起来展开思考、把握和比较，视野显得有些狭窄。笔者认为，选择和变革需要时间，也自然要经历一个由器物层次到典章制度层次再到精神文明层次的演化过程。由于战略位置、国情状况、执政者的思想和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不同，日朝两国的选择和变革各具特色、不尽相同，但也不乏一些共同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程度不等地嬗变，为下一个阶段的激进变革预作铺垫。本书将日本的安政、文久、庆应改革与朝鲜的大院君改革联系起来，探讨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朝先后出现的封建政权改革高潮的兴起与展开，通过比较分析两国改革的异同，以便更加客观、准确地为开港后幕府改革和大院君改革进行历史定位，并从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因此，本课题对于韩国近代史、日本近代史以及近代韩日关系史乃至东北亚近代史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 研究状况

目前，学界有关此课题的基本研究状况如下：

首先，有关大院君改革的单项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尤其是韩国学术界对大院君的研究长盛不衰，出现了数量甚多且颇有分量的成果，也有史料集出版，如前几年刚刚出版的由大院君的后人编的《兴宣大院君史料汇编》（四卷），为有关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相形之下，有关日本开港后幕府改革即安政、文久、庆应改革的研究成果则不多，且大都是日本学者的成果；中韩朝等国学界关于该课题的专题研究还没有看到，只是在一些通史性的论著中有所涉及。

其次，将两者联系、对照起来的双向比较研究成果甚少，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一）开港后幕府改革研究

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幕末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为胜者的西南雄藩。这是因为，其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探明与后来的维新官僚有关联的政治主体是如何产生的。因此，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在天保期乃至安政期以后的藩政改革中取得成功的西南雄藩成为维新的主角，与此相反，在同一时期的幕政改革中失败的幕府却逐渐走向没落。无论是战前的皇国史观还是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没有对作为败者的幕府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当然，自明治期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出现了研究幕末期幕政改革的一些成果，但均局限于与西南雄藩有密切关系的胜海舟、大久保忠宽等部分幕臣的研究。这些成果认为，胜海舟、大久保忠宽等强烈批判幕府的专制统治，提出了与雄藩建立联合政权的构想，与西南雄藩的领导人达成共识，对这部分幕臣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相反，小栗忠顺、栗本鯤等被称为亲法派的幕臣却被当做拥护幕权的守旧主义者受到猛烈的批判^①。旧幕臣中的一些人撰文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如福地源一郎在《幕府衰亡论》序文中指出，“迄今为止的明治维新史皆以叙述明治维新之伟业为主，幕府之事置于客位甚至敌位，若无以幕府为主叙述此间事实之史，天下后世何以得知此间真相”，主张幕末史应以幕府为中心，对以“胜者”为主的

^① 维新史料编纂事務局：《维新史》全6卷，明治书院，1939～1941；维新史料编纂事務局：《概観维新史》，明治书院，1940；等等。



维新史提出批判^①。

进入20世纪60年代，部分学者开始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田中彰在《幕末的政治局势》一文中指出有关幕府及佐幕诸藩的研究非常滞后以及这种倾向战后较之战前更为明显的现状^②。此后，虽然对幕末期幕府研究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但未出现令人瞩目的成果。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幕末幕府一方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小野正雄从1975年开始利用幕府一方的史料陆续撰写并发表有关幕藩权力解体过程的论文^③；池田敬正发表了涉及幕政改革的论文^④。此外，较之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政治史、外交史领域明显落后的有关幕府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现。森田武将横滨开港之后幕府的财政、经济政策置于幕末政治史之中，按照幕府采取的财政政策的特点将天保期以后至庆应期的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具体地论述了幕府的财政政策逐步走向破产的过程，并提出幕府拒绝诸藩的借款要求以及实施以追求幕府利益为目的的产物统制计划等原因，致使幕府与诸藩关系日益紧张并最终导致诸藩脱离幕府的结果的观点^⑤。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研究水平一直处于较低阶段的有关朝廷、天皇的研究以政治史领域为中心积极展开。面对空前的对外危机，在幕藩体制下以幕府为主导、以朝廷为从属的传统幕朝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关注这种幕朝关系的变化并率先进行研究的是宫地正人。他指出，对于幕藩制国家而言，朝廷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只有朝幕和谐，幕藩制国家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才能成为完整的国家^⑥。而此后继承他的研究成果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一步提高其研究水平的是原口清^⑦。箱石大在这些先学们已经取得的研

① 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1892年），后由日本史籍协会复刻，由东京大学出版会于1978年刊行。

② 田中彰：《幕末的政治局势》，《（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十四卷，岩波书店，1962。

③ 小野正雄：《幕藩权力解体过程研究》，校仓书房，1993。

④ 池田敬正：《幕府诸藩的动摇与改革》，《（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十三卷，岩波书店，1977。

⑤ 森田武：《幕末期幕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与幕藩关系》，《历史学研究》430号，1976年3月，第19～29页。

⑥ 宫地正人：《从朝幕关系看幕藩制国家的特点》，《人民的历史学》42，1975年10月，第1～30页。

⑦ 原口清：《近代天皇制成立的政治背景——有关幕末中央政局基本动向的考察》，载远山茂树编《近代天皇制的成立》，岩波书店，1987。

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幕末期幕府对朝廷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整个过程进行了总括性论述，指出幕府最后采取尊奉朝廷政策，颁布《尊奉朝廷条目18条》，是希望通过朝幕结合来实现强化幕府权力的目的，因而招致有志廷臣和反幕诸藩的强烈反对^①。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关幕政改革的多彩且细致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由于幕末期的幕政改革是在欧美列强的军事压力下开始的，因此有关军制改革的研究占中心地位，而且随着日本国内未公开史料和国外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幕末军制改革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例如，随着军制改革的实施，需要大量的铤卒（步兵），从农民中征发兵赋成为一个大问题，通过新发现的地方史料，我们可以弄清当时在天领和旗本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随着幕末幕臣研究对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以往的研究仅限于一部分有名幕臣），分析也进一步深入。菊地久发表的一系列论文^②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收获。菊地久通过对担当幕府改革重任的朝气蓬勃的有司们的人员结构及其思想的分析，论述了从“祖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这些有司为了适应国际社会而主张开国并积极投入改革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改革派势力最终在维新以后由旧幕臣转变成为社会精英的经纬。

随着研究的进展，开始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几乎看不到的对幕府及幕臣持有的肯定评价，即幕府的对外政策并非全部都是被动的，也不失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实施改革方面幕府对诸藩并不是闭锁的；等等。此外，也出现了很多肯定幕府和幕臣在产业技术以及洋学的吸收方面所做出自主性、能动性对应的观点。随着这些个案实证研究的不断积累，幕政改革的诸多成果对此后明治维新政府的政策乃至日本的近代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知。其中，对于军制改革，传统的观点认为幕府的军制改革放弃了全国的防御而只热衷于加强幕府权力以压制反对派，而近年以来，主张幕府军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能够防御包括诸藩领在内的全国的军事机构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熊泽彻的《幕府军制改革的展开与挫折》就是反映这种问题意识的论文^③。他分析了19世纪50~60年代幕府实施的军制改革（限

① 箱石大：《公武合体引起的朝幕关系的重编——解体期江戸幕府的对朝廷政策》，载山本博文编《新近世史》，新人物往来社，1996。

② 菊地久：《维新变革与幕臣的系谱》，《北大法学论集》29卷3号~33卷5号，1979~1983。

③ 熊泽彻：《幕府军制改革的展开与挫折》，载宫地正人等编《日本近现代史》一，岩波书店，1993。



于陆军），主张幕府指导了诸藩的军事改革并显示出以幕府的军制为标准统一全国兵制的强烈意志，但最后尚未取得成果就被推翻。此外，他还主张幕府通过对旧军事组织的解散和重编将直属军变成洋式军队的意图得到了贯彻，幕府实施的军事改革的诸多成果由明治政府所继承，对自上而下的近代军队的编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否定了幕府的直属军改革失败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注技术方面即有关铸炮、洋式造船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横须贺造船所（制铁所）、长崎制铁所、石川岛制铁所、神户海军操练所等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而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一般局限于政治、经济方面。这些新成果打破了以往的研究只限于某些先进设施的局限性，关注范围更加广阔的军事工业。铃木淳的《从“铁炮锻制”到机械工——幕末的步枪生产及其中坚力量》^①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此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安政二年（1855年）着手开始洋式步枪生产的幕府不仅建立步枪制造所，而且允许诸藩独自生产步枪并由幕府的铁炮师、铁炮锻制等给予指导以及在幕府的指导下诸藩的军事工业取得广泛、快速发展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在生产步枪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经验成为熟练工的数量众多的“铁炮锻制”在明治初期成为机械工业中坚力量的事实。因此，铃木淳的论文也主张，在幕政改革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近代日本才获得了发展。

以上，对日本学界有关开港后幕府改革的整体性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述。下面对开港后幕府改革的三个不同时期即安政期、文久期、庆应期的幕政改革研究成果，分别加以概括。

1. 安政期幕政改革研究

毋庸赘言，安政期幕政改革的中心是军事改革。为了对抗巨大的西洋炮舰，嘉永六年（1853年）九月解除了大船制造禁令，安政二年（1855年）八月在长崎的海军传习所、安政三年（1856年）四月在讲武所开始了洋式军事训练。其间，安政三年（1856年）二月设立了蕃书调所，以调查探究欧美诸国的实情。仲田正之的《安政幕政改革中铁炮方江川氏的作用》^②论述了安政二年（1855年）在江户芝新钱座设置的大小炮练习场对安政期军事改革发挥的作用。仲田正之认为，在江川英龙之子江川英敏的指导下，大

^① 铃木淳：《从“铁炮锻制”到机械工——幕末的步枪生产及其中坚力量》，《年报·近代日本研究》十四号，1992。

^② 仲田正之：《安政幕政改革中铁炮方江川氏的作用》，《地方史研究》143号，1976年10月。

小炮练习场接纳众多幕臣并向他们传授了洋式炮术，安政五年（1858年）越中岛训练场开设之后，逐渐转让主导权，以诸藩的初学者为主要对象得以运营，而在大小炮练习场对幕臣开展的训练成为庆应期实施的幕府兵制改革的滥觞，作为引进法国兵制的母体为明治陆军所继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界的主流观点，即幕府的军制改革与近代陆军的创设密切相关。

此外，在《蕃书调所（开成所）的陪臣使用问题》^①一文中，宫崎富美子欲通过对在培理来航后日益沉重的外压下，以成为紧急课题的外交文书的翻译和欧美诸国军事科学技术的吸收为目的而设立的蕃书调所（后改称洋书调所、开成所）的研究，揭示“幕末的特殊性”。毋庸赘言，与欧美诸国的接触和欧美军事科学技术的吸收需要对蕃书（最初为荷兰语，后增加了英语、法语）有充分的理解。这并不是旗本特权阶层子弟的专利，需要具有真正的实力。其结果，开设蕃书调所之后担当研究、教育、翻译的教官大多数是诸藩蕃士，而对幕府而言，他们是陪臣。开设蕃书调所之后，幕府不得不完全依赖从陪臣、浪人中招募的当时堪称一流的洋学者。但是随着蕃书调所（开成所）的教官在履行翻译外交文书等职责的过程中获知幕府重要机密的机会增多，过分依赖陪臣教官的状况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在文久改革时，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开始实施陪臣教官的起用直参化，庆应二年（1866年）采用新的规定，将录用的教官限于直参，以使开成所成为“德川家的人为德川家服务的机构”。宫崎富美子运用翔实的史料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培理来航之后，为了应对对外危机不得不积极录用大量优秀人才，但这又会使得一直支撑幕藩体制的传统组织原则遭到破坏。宫崎富美子通过对蕃书调所（开成所）教官人事问题的论述来反映幕府面对上述幕末期产生的矛盾所采取的姿态，确立了一种新的视点。

与此相关，上白石美的《安政改革期的外交机构》^②聚焦于与外交问题相关的幕府职制的变化，论述了安政期幕府整顿外交机构的过程。上白石美指出，当初由海防挂老中与各奉行（勘定奉行、下田奉行等）形成了外交集团，但是安政五年（1858年）废除海防挂、设置外国奉行之后，政策的制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有关外交、贸易的事项全部由外国奉行处理，这

① 宫崎富美子：《蕃书调所（开成所）的陪臣使用问题》，《东京大学史纪要》二号，1979年3月。

② 上白石美：《安政改革期的外交机构》，《日本历史》537号，1993年2月。



是幕府转向欧洲型外交体系的过程。

此外，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幕府在安政期制定了直接统制全国商品流通的计划，这就是安政二年（1855年）十一月在阿部政权主导下制定的“产物会所设立计划”。该计划经过迂回曲折，以万延元年（1860年）四月设置“国益主法挂”而告终。石井孝的《实践佐藤信渊学说的尝试——设置国益主法挂的思想背景》^①论述了在处于安政改革期和文久改革期之间的久世·安藤政权主导下制定的“产物统制计划”。他指出，以在江户、大阪新设的会所为中心、以地方的豪农豪商为依托将全国的产物控制在幕府手中的“国益主法挂计划”，是由继承佐藤信渊学说的旗本天野三左卫门制定的，后来由于久世广周的退职，文久二年（1862年）七月国益主法挂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就被废除。将幕府欲通过会所垄断全国产物的尝试视为绝对主义经济政策，试图从中寻找久世·安藤政权的性质即绝对主义式“开明性”，石井孝的这种理解方式说明了战后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水平。

2. 文久期幕政改革研究

对于文久期实施的幕政改革，目前日本学界有两种观点，其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确定文久改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改革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文久改革始于文久二年（1862年）七月庆喜·庆永政权成立（一桥庆喜任将军后见职，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职）之后，终于庆喜·庆永政权的崩溃〔文久三年（1863年）三月松平庆永提出辞呈并在尚未获准的情况下回藩〕。由于改革是在敕使大原重德和萨摩藩的压力下开始的，因此实施了与朝廷和诸大名有关的措施，即文久二年（1862年）闰八月缓和“参觐交代制”以及赦免安政大狱关联者等问题成为其主要分析对象。这种观点重视改革是按照京都以及松平庆永的要求实施的一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久改革在庆喜·庆永政权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这种观点聚焦于大久保忠宽、冈部长常、浅野氏祐、小栗忠顺等幕府内改革派的动向，重视在他们的领导下采用的洋式兵制（在陆军内设置步兵、骑兵、炮兵三个兵种），较之前一种观点更加强调幕府在改革中的主体性。

与安政改革相同，文久改革的中心也是军制改革。“参觐交代制”的缓和，其目的也是减轻诸大名的财政负担以使其进行军制改革。因此，有关军

^① 石井孝：《实践佐藤信渊学说的尝试——设置国益主法挂的思想背景》，《历史学研究》222号，1958年8月。